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一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七八期 ——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5a)

【史料辨析】《廖汉生回忆录（续）》辨正	余汝信
【亡灵祭坛】回忆林昭之母许宪民	冯英子
【追寻记忆】我的文革记忆	江水英
【童年旧事】林园杂忆	开口便笑
【各抒己见】从“文化大革命”到文化与制度 ——读《朱学勤在“凤凰世纪大讲堂”的讲话》所想	北国游子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料辨析】

《廖汉生回忆录（续）》辨正

• 余汝信 •

1954年，廖汉生43岁，已是国防部七位副部长之一。翌年，中共首授军衔，七人当中，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获授大将衔，萧克、李达获授上将衔，最年轻的廖汉生为中将衔。虽然，国防部副部长不具实权，只是一荣誉性职务，但这本应为大将、上将才得以拥有的光环为什么会落在仅为中将的廖汉生头上，始终有些令人不解。1956年，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以中将军阶接替刘伯承元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调至握有重兵的北京军区，接替赖传珠上将任军区政治委员。

廖汉生与贺龙、杨尚昆都有一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廖与贺龙同为湖南桑植人氏，两家仅隔一座山头。廖自幼与贺龙二姐的女儿订下了“娃娃亲”，所以，文革中有廖是贺的外甥女婿的传闻，大抵与事实相符。廖高小毕业之际，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正席卷湘西，他跟随贺家姐弟走上了工农武装革命之路，自此与贺龙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中期，传说乡中妻子已歿，贺妻薛明便将延安时期的同学白林介绍给廖，白林，就是杨尚昆的妹妹。建国后，却又得知贺龙

的外甥女尚在人世，但与白林的婚姻木已成舟，廖因此对前妻不免有负疚之感。与贺龙非同寻常的关系，文革前，是廖汉生政治上的正资产，这也许是他中共建国后仕途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文革中，正资产变为负资产（这是一个近年才出现的新名词），因为有这一正一负，叙述其建国后军事、政治生涯的《廖汉生回忆录（续）》〔1〕，也就应该颇具可读性。

1、杨尚昆的妹夫

1965年11月间，廖汉生正在河北邯郸参加“四清”，得知白林的五哥杨尚昆被突然免去中办主任职务，调往广东工作。“当时，我们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干部下放，能上能下嘛，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什么問題。杨尚昆离开北京时也没有对亲属们透露半点真实情况”。“直到1966年4月14日晚，在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我才第一次听到李雪峰传达‘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2〕，“从4月14日第一次听传达，到这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一直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没有向妻子白林透露一个字”。

中央高层的斗争，连廖汉生这样地位的高干开始时都未察分毫，关系到妻舅政治生命的大事，也只是在组织上正式传达时才“第一次听到”，且不能向妻子“透露一个字”，当时中共党内组织纪律之严密，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虽然与杨尚昆关系不一般，但廖对杨经历的叙述却未必准确。廖谓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委秘书长，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据《杨尚昆回忆录》，1940年，杨离开北方局回延安，北方局书记名义上仍由杨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代理。延安整风时期，中央仅分配杨担任一些研究性工作，这与杨被视为是当时正受批判的国际派一分子有关，同一原因，虽然杨1944年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由候补中委递补为正式委员，翌年“七大”却未能重新当选。当时，“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接踵来到延安。中央决定我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来客，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用的对外身份是军委秘书长”，杨在下文中又一说法是“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3〕不管是“军委秘书长”或“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笔者认为，似应后者为确），按杨自己的说法，都是“对外身份”。所谓“对外身份”，就是虚衔而不是实际职务，毛此时期不可能将任何重要军内职务交杨。他的实际职务是中央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长。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调任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据《杨尚昆回忆录》，“李富春同志一走，弼时同志提议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李富春同志临走时，把办公厅的工作向我口头移交”，“后来到了西柏坡才有正式的任命”。〔4〕所以，据杨本人所说，他实际上自1945年已是中办（时称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1948年再由中央正式任命。而不论是1945年或1948年，杨担任此职务是在“解放前”而不是“解放后”。话扯远了。

廖汉生说，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原在国务院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白林，“就因为尚昆的‘问题’，不适合做党办工作，调整到其他处工作”，“20天以后，贺龙元帅家里传话给我，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事隔一天，王尚荣来到我家，转达了贺龙副主席的意见”。周恩来是什么意思？贺龙又是什么意思？廖汉生都没有说清楚。随后，“我向白林转达了领导同志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察”，廖又分别向贺龙、叶剑英、李雪峰、杨勇、郑维山汇报了情况。

妻舅出事，妻子的工作都要作调整，要“接受组织的考察”。什么叫“株连”？这就是“株连”。不过，对廖汉生本人，似乎一时尚未波及。

2、扩编前的北京卫戍区

忆及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的紧张日子，廖汉生说：“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的当天深夜24时，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我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了北京军区的任务：调两个师来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廖接着说：“北京卫戍区原有一个警卫师，担负着中央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重要部门、重要场所和领导同志住地的警卫安全工作，分布在全城各个值勤点上。除此之外，卫戍区主要是领导北京市各区、县人民武装部和民兵工作，人员不多，机关不大，一度曾成为精简的主要对象。1965年以后，卫戍区的力量有所加强，傅崇碧同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廖汉生这里的叙述有不确切之处。按上下文理解，他以上说的是1966年5月北京卫戍区的情况，而“北京卫戍区原有一个警卫师”，应是1963年前的事。

1963年3月，根据军委第168、170次办公会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的决定，总参通知公安部队和北京军区：今后北京市的警卫工作统一由公安部队司令部负责，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师（含仪仗营）除建制仍属北京军区外，其日常工作由公安部队领导指挥。公安部队3月31日通知，首都警卫师的各项工作，自4月1日起由公安部队负责领导。该师自4月1日起启用新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都警卫师”。5月25日，军委决定，首都警卫部队领导体制变动后，仍保留北京卫戍区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北京市民兵工作，首都战备工作和一般卫戍勤务工作等。至此，北京卫戍区仅直辖18个县人民武装部（5）同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1963年是削弱北京卫戍区，加强公安部队，1966年倒了过来，撤销公安部队番号，加强北京卫戍区。

1966年3月2日，根据军委2月4日指示，北京军区决定：由陆军第63军负责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该团编制员额1,500人，代号4885部队。3月27日，第63军将新组建的独立团移交北京卫戍区。（6）文革中有所谓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传闻，即为组建该团时需借北京市的大学房子临时使用，学生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所引致。其实，组建工作与贺龙毫无关系，一个仅有1,500人的新组建团，又如何能够“兵变”？

3、杨成武的“再研究”

北京卫戍区的扩编过程，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说得颇为详细：“要调两个师的兵力进京，此事重大而且紧急。我立即按照杨成武代总长的指令，找到杨勇、郑维山、傅崇碧等同志，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大家连夜商讨落实的方案，初步拟定调第63军第189师和第24军第70师进京，归卫戍区建制”，“第二天下午，我利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间隙，将昨晚讨论的经过和拟出的方案向杨成武代总长做了汇报。杨代总长表示：同意63军调一个师，另一个师则可以提出几种方案来，再研究”，“当晚，我将杨代总长的意见及时转告了杨勇司令员”。其时，北京军区建制内共有6个野战军，其中2个军各辖3个陆军师，分别是：

24军：70、72、197师；
63军：187、188、189师。

另4个军各辖2个师：

21军：61、63师；

65军：193、194师；
66军：74、196师；
69军：28、107师。

要迅速地从各军中成建制地调出两个师，不用说，只有从24、63军各调出一个师，北京军区提出的本来是一个十分便捷、合理的解决方案，根本不用什么“再研究”，可是，出乎廖汉生、杨勇意料之外，方案在杨成武处却卡了壳。

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毛泽东阅后批：照办”。（7）

如按廖汉生所述推断，周恩来上报给毛泽东的方案，提议者就仅是杨成武本人，这并不是北京军区议决的方案。此事周并没有与北京军区协商，仅是与杨成武一个人协商。驻张家口地区的陆军第65军，前身为1948年9月组建的华北军区第8纵队，1954年10月从朝鲜归国，辖193、194、195师三个师。1960年，195师调归军委工程兵建制，65军自此只剩下两个师，（8）如按周恩来、杨成武的方案再将193师调出，65军岂不只剩下194师一个师？那还成什么军？而且，为什么不将近在京畿的24军70师转归卫戍区（驻地不用变动），而要舍近求远，从宣化地区调来193师（营房要重建）？杨成武所谓“再研究”的结果，真是匪夷所思！显然，在杨成武心目中，195师是华北山头的，70师不是。刚成立的卫戍区独立团，已是由华北山头的63军负责组建，现又先确定从63军调入189师，再进而不合情理地从65军调入193师，杨成武意欲何为？这除了证明杨成武企图以华北山头彻底控制北京卫戍区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解释？

周恩来、毛泽东似乎一时都不明白其中奥妙，一个上报，一个就批，此事似乎也就板上钉钉，不能更改了。但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还是据理力争。据廖汉生回忆道，5月19日下午，军区党委常委讨论，21日晚，又正式上报了方案。

如果廖汉生记忆没有错，北京军区21日晚上报的方案，肯定与周恩来、杨成武18日上报毛泽东并已经毛批复了的方案有所不同。是否如此？廖汉生在回忆录中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这可能是为杨成武讳吧。

事情峰回路转。据廖汉生说，在5月26日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当场确定调第189师和第70师进京，担负首都警卫任务”。据有关部门正式出版的军史，189师是于5月27日与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一道调归卫戍区，第70师迟至6月15日正式调归卫戍区。（9）不少学者论及北京卫戍区扩编一事时，只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即作定论，未知后头还有如此一段曲折变化。《周恩来年谱》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未最终定夺或以后有所变化之事，编者误作为定论记载，这是我们在读《周恩来年谱》时须加以注意的。

4、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谈及与贺龙关系时说：“我跟贺龙的关系更长，更深。我跟贺龙是家乡人；我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我的前妻是贺龙跟我父亲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我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一直到她牺牲；我参加革命是贺龙的影响和带领，入党是贺龙和关向应作介绍人；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难逃的”。

廖汉生认为，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要削去第二副主席贺龙的“羽翼”，而同是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廖本人及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都是“羽翼”之一。王尚荣早于1966年9月2日已被总参宣布停职反省，起因是与代总长杨成武的矛盾冲突，杨认为王要夺他的权。对王停职一事，目前尚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林彪涉及其中。而林彪是否真的说过要对贺“削其羽翼”？他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过这句话？亦无从考证。事实上，直接对贺龙采取“措施”的，却是周恩来。

贺龙的政治生命其实在1966年9月后已出现危机，延至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代表中央，正式与暂寄住周处的贺龙谈话，据《周恩来年谱》引述谈话的大意为：“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在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10）次日凌晨，周派杨德中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不知所谓“安静的地方”，与打入冷宫有何不同？“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事后证明也是一句假话，周借此扔掉了贺龙这个熨手的山芋。

上述谈话内容显然并非原话。以周的性格，当时不可能直呼林彪其名，这是其一；以谈话的口气，周似乎不是在代表中央，而是代表林彪与贺龙谈，这是其二。周即便是说了这些话，那也是借林彪为自己找个台阶下。自1927年南昌暴动始，在共产党最背运时（贺龙语），贺即追随共产党，周对其应十分了解。追随四十年的结果，是将其弃之如敝屣，对此突而其来的打击，贺只得对天长叹：“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贺指谁“把我看成这样的人”？林彪？周恩来？毛泽东？贺龙与林、周、毛三人的关系，以及他在文革前期即被打倒的整个过程，说来话长，这里就此打住。

廖汉生是先于贺龙而被关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队伍，也不例外。

1967年1月8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在城里庆王府的原司令部办公地、现为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开，研究“文革”运动的有关问题。正在开会期间，军区保卫部打来电话，报告说：‘文工团‘造反’的人已经出发，到廖政委家里去了’。我的家就在后海，离庆王府很近。接到报告，党委副书记郑维山同志离开会场，出面去和文工团造反的人交涉。郑维山同志走后，列席常委会议的干部部董奋部长说道：‘今天早上，在西山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里，有人给廖政委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就是为着这张大字报来的’。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而压抑。会议无法再开下去，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我清楚地知道：厄运已经来了。过了一些时候，郑维山副书记返回来。他对着我，也是对着大家说道：‘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我知道这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收起笔记本，掏出文件柜的钥匙，一同放在桌子上，然后向主持会议的党委第二书记杨勇和全体常委委员们告辞：‘我回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一出会场，我就失去了自由，被人押着回到家”。

廖汉生是话中有话。郑维山明知廖厄运将至，但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事”，实际上是将廖骗出了会场。杨勇和全体常委在最后关头也没有明确表示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将还是军区党委第三书记的廖交给了群众，廖当日即被关押。这一切是否早有预谋，仅廖一人蒙在鼓里？荣损之间，廖汉生肯定深深感受到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我是1月8日被抓起来的，1个多星期以后，杨勇司令员也被抓了起来。就这样，北京军区成为全军12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

一个军区，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杨、廖被抓，直接得益的应是郑维山。196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郑维山代理军区党委书记。196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1）至于那一张挑起事端的大字报——“他们简要讲述了大字报的内容：你有4条罪状，一是杨、廖两家关系密切，杨尚昆的问题出来以后，你为什么不能揭发？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错误，政治委员难道不负责任吗？三是你身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为什么插手第1军？四是对总部不尊重”。

大字报是谁写的？廖没有点明，仅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全军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写的”。后来“1979年秋，大字报的署名者中的一位给我写了道歉信”。

据笔者了解，大字报的署名者，是谢镗忠和李曼村等，写道歉信者，指的是谢镗忠。谢，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李，时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两人均为1967年1月11日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未几，双双被打倒，文革后期获解放，谢镗忠1975年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军区顾问，1985年9月离休。李曼村文革后任军事学院副政委、国防大学副政委至1988年离休。文革中先是积极分子而后成为受害者的，谢、李也算是典型。

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办信访处摘编的廖汉生女儿廖春英致毛本人的信“内容摘要”页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毛所谓林彪指使的“个别人”，指的是谁？郑维山？谢镗忠和李曼村？所谓“未经中央讨论”，恐怕亦非事实。北京城里的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双双被关押，“中央”及毛本人难道从1967年至1972年五年间都从未听闻？据有关组织史资料，1967年3月，中央军委就已批复“责令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前述1967年10月郑维山代理军区党委书记，是中共中央批准的，1969年6月郑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中央任命的，杨、廖不倒，郑何以能任命？这一切难道“中央”及毛本人也能说毫不知情？林彪一个人可以批发中央文件吗？毛泽东讲的，显然不是真话，说穿了，他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自己永远正确。（2004年3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一）

注释：

（1）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本文引自该书的叙述，不另一一注明页数。

（2）廖汉生自华北局于1960年成立始即为书记处书记。惟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是5月24日才发出，华北局是否4月14日已开会传达，存疑。

（3）《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221。

（4）同（3）书，页234—235。

（5）（9）参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北京市军事系统组织史资料部分。

（6）《陆军第63集团军组织沿革史》（第63集团军军史编研办公室），页58。

（7）《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1—32。

（8）《陆军第65军军史》（第65军军史编审委员会，1989），建制序列沿革一览表。

（10）同（7）书，页114。

（11）《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153—154。

（12）《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下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页1363。

~~~~~  
【亡灵祭坛】

回忆林昭之母许宪民

• 冯英子 •

许宪民，女，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居民。其女儿林昭（北京大学1954级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20年又于1968年改判枪决。

许宪民同志，大革命时期江苏省委许金元烈士之妹，幼随其兄投身革命，为苏州第一个穿上军装之女兵。平生支持革命事业，未遗余力。其女林昭同志，先后就读于苏南新专和北大新闻系，有志于新闻事业。十年动乱中，母女均被摧残致死，前年始获昭雪。壬戌四月，由苏南新专与北大部分师生，为营墓于苏州灵岩山韩蕲王冢侧，植树立碑，刻林昭遗书于其上，有“他日红花发，认取血泪斑”等语。

许宪民二十年祭

……在接近解放的前夕，中共中央华中局江南工委，曾派陈伟斯同志到苏州，设法建立一架电台。陈伟斯同志找到了许宪民，她以满腔热情，支持了陈的工作，用积存的二百元美金，为陈配备了电台，能同苏北通话。有趣的是，她还向陈伟斯提供了不少情报，她通过国民党的一个电讯局局长，窃听国民党的来往电讯，交陈使用；她通过因刺孙传芳而名扬天下的施剑翘，打入上海警备司令部陈大庆的心脏，弄到一些情报，交陈使用。这些材料，都是陈伟斯同志直接告诉我的。陈是我《新闻日报》的同事，他的家在苏州时也同我住在一起，那幢前门在镇抚司前、后门在桂和坊的房子。在“反右”时候，竟说陈是假党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现在陈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离休干部，问题弄清楚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

1957年，“反右”开始了，许宪民的大女儿林昭，这个从小热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江南女儿，这个一言一行都用四卷宏文作为自己做人、求学标准的北大学生，这个从小就受到母亲那种正直、热情、像一团烈火那样性格陶冶出来的女儿却变成了“右派”，林昭自己，当然始料所不及，而许宪民呢？更加痛心疾首了，她想不到用最大精力去培养出来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的“敌人”，这一下，她如同从高空摔了下来，天地茫茫，不知所措了。

许宪民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这个打击比她自己划成右派更大。有一次，林昭从北京回上海，我请她母女两人吃饭，我发现她消沉得很，似乎已经失去了自信，年轻时候的如火般革命热情不见了，年轻时候的豪情慨，也开始从她身上消失了。

然而更大的打击却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1966年，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工作。运动一开始，我这样的“老报人”自然在劫难逃，先被抛出。那年8月17日，我们那里的“造反派”就把我打成“牛鬼蛇神”，关入“牛棚”，直到第二年5月13日，才宣布“解放”，但好景不常，到了这年12月，张春桥对上海的老知识分子要来一次彻底的扫荡，跟在张春桥、徐景贤后面的“造反派”，自然闻风而动，率先响应，我又一次成为“牛鬼蛇神”，而且因为我在香港作过《文汇报》和《周末报》的总编辑，罪名竟然是出卖人民、出卖祖国的双料反革命分子，真是骇人听闻。但最使我不安的，我们单位的那些“造反派”，竟然无缘无故去抄了许宪民的家。

那是1967年的12月22日，那天，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都登了我们单位一个造反派的来信，而且两报各自加了口径一致的《编者按》。当天晚上，我们那个单位的在徐景贤旗帜下的“造反派”，分八路出动，打人、抄家，无所不为。恰巧那天白天我去过许宪民的家。他们得悉之后，竟以查抄我一个文件为名，去抄了许宪民的家。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折腾到深夜，箱子只只撬开，书籍、杂物，丢了满地，狼藉不堪。我做过几十年新闻记者，总算见过不少违法乱纪的行为；也看过法西斯暴行的纪录，然而这个样子的无法无天，却为有生以来所仅见，而它偏偏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在挂着“新闻战士”标志的“造反派”手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无法解释对许宪民的歉意。然而许宪民在遭到这场飞来横祸之后，却并不曾对我有任何误会，她知道在那样情况下，一个正常的人，特别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当我的住处被缩小到只有八九平方米，连三张吃饭的桌子也无法放进去时，她还经常到我的斗室来坐坐，即使我去了“五七干校”，还经常有着来往，书本上说的相濡以沫，相嘘以气，大概正是这种情形吧。

有一次她告诉我，有两个人向她“外调”，查问我同特务的关系，她告诉他们，从她认识冯英子开始，就知道特务一直盯着他，至于他同特务有什么关系，却没有听说过。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从那些“造反派”的眼中看来，我在香港，论地位，论生活，都不知要比国内好多少，为什么丢掉了这些回来呢，不是另有原因吗？什么原因，他们的常识只能想到“派遣特务”上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待自己民族、自己祖国那种深沉的受，他们能理解吗？不能！他们有这样的情操吗？没有！这也正是“夏虫不足以语冰”罢了。

不久，这场“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在苏州横扫一切，许宪民被撤回苏州，批斗、折腾，折腾、批斗，最后竟至替她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个月发30元生活费。而她呢，还要从这30元中抽出一部分来，抚养她在上海的儿子。困顿的生活，艰难的岁月，一步一步把她推向下坡，发展到衣食不给的地步。有一次我到她家中去看她，发现床上只有两条棉胎，连被面和被里也没有了。许宪民这样的人，她做过银行的经理，做过“国大”代表，无论如何困顿，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后来我发现，她之所以如此困顿，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家庭烦恼上，那时，她的大女儿作为“死不悔改的右派”，被关在提篮桥的牢中，她的二女儿则在一家医院工作，绝少回家，她的儿子呢？则自有他的生活方式，母子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语言，这也使许宪民伤透了心。

1968年的春夏之交，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她的大女儿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牢中被杀害了，通知她这个消息时，还要向她收取五角钱的子弹费，因为“无产阶级的子弹，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费”的。许宪民接到这个噩耗时，五内俱焚，欲哭无泪，整整一个晚上，徘徊在苏州河的边上，几次想纵身一跃，了此残生。也不知什么原因仍然鼓起了她求生的勇气，第二天还是拖着疲乏的身子，摸回那空无一人的家中。记得不久之后，她同我谈到这件事时，真的哭了。相识几十年，这个内心刚强到极点的女人，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她给我看了林昭一些遗作，这个不满40岁的江南女儿，她那么深沉地哀悼着民族的不幸，人民的苦难。我读着这些作品，也不能不流泪了。那时她为了逃避儿子的虐待，家里也不敢住，常常这个朋友那里住几天，那个朋友那里住几天，我开头还不懂她为什么如此神秘，后来才弄清楚了。

大概是1973年的秋天吧，那时我早已离开了“牛鬼蛇神”的队伍，作为一个“解放干部”了，可是人还在“五七干校”，而且我们那个连队对我还有“法外施仁”的“照顾”，把我弄到饲养场去养猪。不料我一到饲养场，却大为称心，因为那些猪猡没有人类的机心，比有些人好伺候得多了，而且一个月有四五天休假，一回上海，脱下了那像三代贫农般的“制服”，换上裤缝笔直的裤子，在马路上遛达，思想上一点儿负担也没有，那倒真正是一种休闲的生活。



一天，我正在复兴中路陕西路附近遛达，忽然有一个疯婆子向我迎面走来，她同我擦身而过后，回过头来向我招呼：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大吃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只见她披着一头乱发，穿着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在秋风中显得很萧瑟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跟了，那毫无血色的面孔上，嵌着一对目光迟钝，满含忧伤的眼珠。她说话时环顾左右，带着一点恐怖神情，那样子有点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终于认出来了，她是许宪民。

“大姐，是你！”

我惊诧得不知所以，看到许宪民变成如此模样，一种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说话，她已经加快脚步，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很明显，她是避着我，也怕连累我，因为她那时头上带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这个从1925—1927年大革命开始，就献身于社会的人，这个为中华民族自由和独立奋斗了一生的人，竟然是“历史反革命”，什么是历史呢？难道可以由“造反派”随意制造的吗？一个民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讲呢？看到了许宪民之后，我一连不安了几天。

过了一年多，我离开了“五七干校”，搬了家，有一天借了辆黄鱼车去运点东西，在延安路茂名路口，碰到许宪民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妈妈死了”，几乎如一个晴天霹雳，这时我才想到，那次在复兴中路上的邂逅，竟然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我认识许宪民将近半个世纪，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几乎付出了全部热情，不想她竟得了这么一个结果，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许宪民得到了平反、昭雪，她的女儿林昭也得到了平反、昭雪，而且北大校园还为她设了一个纪念堂，才觉得心中平静下来，然而，许宪民的最后的那个样子，却永远无法从我心中抹去。

我不知道许宪民死的确切日期，也不知道她怎样死的，有人说她最后还是跳了苏州河的，有人说她死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反正这一切已无关紧要，但我确实看到过许宪民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文件，述说她在家中的遭遇，一个在社会上奋斗一生的人，却逃不过家属对她的虐待，因此，当我接到为她开追悼会的讣告时，我也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不曾去参加，因为我确实不想看那些曾经折磨过她的人，此时此地，又在扮演什么角色。

许宪民和林昭平反以后，林昭的同学为她们母女在灵岩山后面造了两座坟，坟对着韩世忠的墓地，虽然我知道坟中其实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去了几次，以寄托我这个小弟弟对她的哀思。

今年是许宪民逝世的二十周年，现在苏州的青年朋友，大概都不会知道许宪民其人，其实，她对苏州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江山信是东南美”，东南之美，就美在有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思想。她像一团烈火，燃烧着人间。我以为苏州人是不应当忘掉许宪民的，有许宪民这样的人，也才是苏州的骄傲。我希望《苏州杂志》登我这篇文章，也希望苏州的朋友记住这些历史。

乙亥春节，写完于上海。

□ 摘自“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原著：冯英子《风雨故人来》

~~~~~

【追寻记忆】

我的文革记忆

· 江水英 ·

文革已过去二十余年，它已成为历史。文革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道深深的刻痕。当那一切的暴烈和热狂在历史的风烟中消失的时候，我们为之付出代价的一切，理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灵的永远的记忆，从我们，以至我们之后的世代。——谢冕

一切如在眼前，一切似又早已湮远。当我们回忆起那个名叫文革的年代时，凭着那些汗牛充栋的著述，我们似乎可以口若悬河，但当我们真正开口时，我们不禁疑窦丛生：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那样说？那样说可靠吗？我们的言说是否遗漏了什么，或者有所偏袒？……就凭着这些疑问，我们就应该深深感到重新追寻文革记忆的必要。

我爷爷在文革时是生产队长，原因是在全队的贫下中农中，只有我爷爷一人读过高小同时又是党员。那时庄上有一个地主，但地并不多，解放前租出去的地不过是二十亩上下。倒霉的是全生产队十一户人家就他一家租过地，文革时他便属于“地”那一类，连同他的妻子（当时有四十五上下）一起被全庄人戴高帽、泼粪水、游街。但是却没有抄家，地主主动将手镯、古书、做粉丝的工具等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求不相符的物件交到大队。家里还有一辆刚买不久的自行车，地主怕被发现，竟是趁着黑夜藏到河底的。我爷爷说其实当时大家都知道地主家里有辆自行车，可是一庄人都装作不知道。虽说是地主，可也没有作过什么大恶，甚至还时常行善，却落得这番田地，再在人家的伤口上捅一刀，怎么说也不是仗义的事，况且都是一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要共事呢。一眨眼，文革过去二十余年了，地主依旧在世，地主的孩子们也各自成家，并且都是庄上的富户。庄上哪家若是一时短钱都喜欢到地主家去借。地主很慷慨，与庄邻并没有什么怨恨。他知道当时像他一样受罪的不是他一个，不怪庄上的任何人，包括组织批斗的我爷爷。顺便说一句，地主现在经常和我爷爷在一起搓麻将。

我的父亲是1972年高中毕业的，那时家里很穷。父亲姊妹六人，连一条象样的裤子都没有。高二了，父亲冬天还是穿着烂棉絮“劳动布”做的大腰棉裤。吃更加困难，有一次父亲放学回家甚至饿晕在路上，幸亏本庄的一个表叔把父亲背回家。虽然饿肚子，但父亲还是学校京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京剧团的好象叫红旗或者东方红京剧团，忘了），演过少剑波和李玉和。父亲说当时虽然饿，但是作为演员他很兴奋，看戏的群众也很兴奋。有一次，京剧团到我所在的大队演出，父亲演到一半大腰棉裤竟然掉了下来，露天戏台下面笑声一片，看过父亲演戏的人至今还记得。父亲说演出有一个好处，每到哪里都可以吃一顿饱饭，甚至能吃到肉。

父亲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女生，叫张苏田，父亲叫她六姐。六姐家在镇上的机关里，定量户口，粮食是定量供给的。父亲在班上是最小的，聪明、学习好，但是家里非常穷。六姐知道父亲家里比较穷，便经常带些食品给父亲。中秋的时候，六姐竟然带好几块糖饼给我们全家吃。父亲说和六姐感情很好，六姐来还过我们家，但是大概终因为我们家实在太穷，没有成为父亲的妻子。在农村文革比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还要缺吃，六姐在那个年代给了父亲很多温暖，父亲提起至今还非常激动。后来父亲成了班级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六姐知道了，默默地离开我们那个乡镇，随她的父母到市里去了。

这是我的爷爷和父亲的文革记忆的三个小片段，对我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它们让我知道文革决不是或者说决不仅仅是“四人帮”“知青”“样板戏”“红太阳”“阶级斗争”“灾难”等等似乎只剩下能指的语词堆砌成的文革。文革是活生生的异常丰富的文革，十年中不仅有斗争，还有爱，人民也并不是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在文化上，老百姓似乎还是兴奋的。文革或许可以说是悲苦、激情、欢乐共在的文革。而如果想获得这种感受的话，我想应该可以重新追寻对文革的记忆，回到个体，回到个体的言说。甚至，如有可能，文革的历史还可以重新讲述。

我期待着。

~~~~~

## 【童年旧事】

### 林园杂忆

#### • 开口便笑 •

1964年，我随父母移居山城重庆。新建的军事通讯学院就设在林园。林园地处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上，山下就是著名的渣滓洞白公馆。此地原是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因车祸辞世后，这里又成为蒋介石在重庆住地。园内有蒋介石的住所和宋美龄的舞厅。环境清幽，林木茂盛。有奇花异草，碧泉清溪。重庆是长江四大火炉之一，夏日闷热难耐。林园的温度却要比山下低好几度，是山城的避暑佳地。接风宴上，还没尝其它食物。我就被面前的一盘红红的辣椒吸引。见其非常可爱，不禁拿起筷子夹一只入口，顿觉一团火在喉咙口燃起。欲哭无声，泪流不止。这是重庆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学校一下不上课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玻璃很快都被砸光。高年级同学成立了各种红卫兵战斗队。我认识的一个五年级学生，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他自任头儿。他来拉我去凑热闹。队部好办，砸开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门口贴上一张“XXX战斗队队部”的牌子就成。但是没有钱，连个袖章都没有。头儿来找我商量，打我们班级的羊的主意。这头小羊是我们班为了响应学农的号召养的。在班里养了一年。上学时，羊就放在学校，每天大家轮流喂它青草。放暑假时，我把它带回家。每天带着它满山乱跑，给它找各种各样的食物。我还记得我从收过的白薯地里刨出残留的白薯根，用小刀削成薄片，喂给它吃。小羊特别喜欢吃，吃完了就用黑黑的眼睛感激地看着我，满意地咩咩叫。我虽然舍不得它，但是革命和友谊好像比一只羊更重要。就只好看着它被牵到市场去了。小羊卖了8元钱。头儿用这钱印了十几个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三字。头儿自己是001号，给我发了002号。这个袖章我没戴几天。后来就被用来包灯泡做暗室红灯用了。

我们的战斗队什么事也没做。只记得有一次，和另一个战斗队辩论十六条，无胜负。约定以摔跤定输赢。当然不是打群架。就像是古代打仗一样，由双方头头单挑，小喽罗们只是在旁边呐喊助威。赢者欢呼雀跃，输者一哄而散。结局是我们的头儿将对方摔倒在地。当然算是我方立场得胜。很快，我们觉得战斗队不好玩，大家做鸟兽散，回家玩去。

不时就传来消息，在中央隐藏很深的走资派、特务、叛徒被一个个揪出来。刘邓陶之后，就是王力、戚本禹、杨成武、刘志坚。毛主席的红卫兵眼睛太尖了，新起的走资派隐藏都超不出三个月。身边的阶级斗争更是触目惊心。我家住在红楼，那里住的都是院里的高层干部和教授。这时红楼成了重灾区。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只见一户户，门旁，窗下被刷上了大字报，大标语。不是叛徒特务，就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看看左邻右舍一个个落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哪天轮到我家。终于有一天，家里窗下也贴上了标语和大字报。父亲作为教研室主任，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大字报上赫然一条，反对毛泽东思想。说父亲反对每节课不管相关不相关，都要引用几条毛语录。父亲被打倒之后，我的心情反倒安定了。就像等待注定会发生的灾难，等待的过程比灾难本身更让人难受。这么多认识的人都被打倒了，被倒觉得打倒也不那么可怕。我的朋友们的父母也很少有人幸免。有一次母亲与造反派发生了争执。造反派用带铜扣的皮带抽在母亲的背上，留下了一道血印。还不肯罢休，一大群造反派们闯进我家，动手抄家。母亲被他们押在窗台前批判。窗外一群孩子在围观。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母亲让我别哭，不要害怕他们。当时我很为我的流泪而羞惭。他们把我家的书扔了一

院子。还抄走了一些书和笔记本。临走时一脚把碗柜踹倒。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柜里的瓷器都粉碎了。

毕副院长是我家的邻居。1947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美国留学时，他得到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博士，和袁家骝吴健雄都同过学。他是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创始人，国家一级教授。文革开始后，他就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打倒，长期关入牛棚。他事父至孝，一直奉养老父在家。老父亲在他被抓后，惊吓病重而亡。他被造反派押回家，只能在父亲尸身前磕一个头，说了一声“父亲，是我连累了您。”没来得及给父亲办后事，就被押回牛棚。造反派也抄了他家，说是为了搜查特务的收发报机。抄家的第二天，他夫人就悬梁自尽。毕教授有一独子。1958年中共“拔白旗”运动，大整知识分子。毕教授首当其冲。当时其子正在上大学，和班上的一女同学在热恋中。毕教授的问题被内查外调，捅到儿子的学校。因此儿子的女朋友也和儿子分手。其子竟不堪失恋之痛，精神失常。毕教授为此深深自责。只好为儿子用重金聘了一个农村姑娘做媳妇。他上养老父，下抚疯儿。儿子不发病时也还正常。毕教授终于抱上了孙女，得享四世同堂之乐。现在却赶上了文革，闹了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媳妇抱着女儿回了娘家。疯儿子无人照管，每日在街上乱走。饿了在垃圾箱里翻点东西吃；困了随便找个地方睡觉。好几次在街上看见他，衣衫褴褛，赤足蓬发，脸色黝黑，皮肤上厚厚的泥垢。被一群小孩子，叫着“疯子”，追赶着扔石头。不久，他就死在街头了。文革后期，毕教授重新工作，媳妇已经改嫁，他和小孙女相依为命。虽经如此人寰惨剧，毕教授仍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被评为工学院院长。

文革十年中，穿插着各种整人运动。大的有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清队由军宣队工宣队领导。清队期间经常在礼堂开全院大会。开会时，所有已被揪出的“阶级敌人”都站在台上，每人脖子上都用铁丝挂个大牌子：无非就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主持人宣布，革命队伍又取得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经群众检举揭发，内查外调，我们又挖出了一个定时炸弹。现在把大叛徒，特务XXX押上来。这时预先在目标左右埋伏下的骨干分子就把目标的领章帽徽扯下，架起胳膊，把XXX一路小跑押上台去。戴上准备好的牌子。然后大家高呼口号，“打倒XXX。”这样的大会两三天就有一次。渐渐地台上已站不下了。只好改为每个系各自开会。父亲有一天也被押到台上了。罪名是特务。被揪出的人都隔离起来，不能回家。每天写交代材料，监督劳动。军宣队，工宣队也把我们这些无学可上的小孩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我们对着毛像，边跳边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话儿要对您讲……。”我们的学习班有一次遭遇了清队劳改队。看着父亲推车的身影，我感到了被排除出人群之外的孤独和屈辱。几个月后，父亲被解放回家。全家在家里包饺子庆贺。父亲说：他的罪名源起于青萍之末。解放前，他找工作时，从报纸上得知一个机构招考技术人员。要考试。他就报名了。考了一天，发现考题和自己的兴趣不符，就没有参加第二天的考试。后来得知那是中统在招考技术人员。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人因为受不住逼供，把他咬了出来。

造反派们很快地卷入了打派仗。一般的牛鬼蛇神也被他们遗忘。重庆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叫八一五，一派叫反到底。重庆是文革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几家大型兵工厂，造枪造炮造兵舰造坦克的都有。除了飞机，所有武器都用上了。每天都能听见炮声隆隆。谣言也是满天飞。一会儿说一派要血洗山城；一会儿说另一派要炮轰江北。我们晚上则爬上山头，俯看山下的战火纷飞。夜幕下的嘉陵江，一串串的曳光弹慢慢横过天际，象节日的焰火。再加上扫来扫去的探照灯光柱，非常好看。有时探照灯几乎要扫到脚下。我们赶忙把头往草地上一趴，担心被发现，引来一串炮弹。

武斗要武器，各派都在挖空心思搞枪。我们院外就是一条公路。有一天，一支军队换防经过此地。早已获得消息的八一五派们聚集在公路旁，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几面横幅迎风招展，上写“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热烈欢迎xx军”。军车停下，造反派就往车上拥。

手里拿着水杯，鸡蛋就要慰劳我们的子弟兵。战士们则你推我让。好一副劳军景像。看得旁观的我们感动不已。突然大喇叭里一声令下。八一五派们把水杯，鸡蛋一扔，一起去抢战士们怀中的枪。战士们措手不及，又没人下令反抗。一会儿，就全部被缴械了。再看当兵的，已是军衣散乱，有的无帽，有的丢鞋。八一五派得胜回朝，好不高兴，一激动就对天鸣枪庆贺。却发现所有的枪都打不响。原来当兵的早已料到，把枪里的撞针都拆掉了。

我们曾经在学校捡了一颗真手榴弹。偷偷带回家后，想把它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用锯子锯手榴弹木把。怕手榴弹爆炸，我们把身体躲在一颗大桃树后面。希望万一手榴弹爆炸时，桃树能保护我们的头。还没把手榴弹木把锯穿，就被一位家长看见，制止了我们的行为。

有一次，反到底派来我院表演节目。我们也去看。演到一半，八一五派来捣乱，往场子里扔石头。有人被打得吱哇乱叫。警卫连是支持反到底派的，就抓了几个捣乱的人到警卫连驻地。八一五派纠集了一大帮子去要人。演出演不下去了。我想跟着去看热闹，被我姐姐叫住。刚回到家不久，就听见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再过了一会儿，就听说邻家的小三子被子弹在右侧脑袋上擦了一道。原来那天晚上八一五派冲进了警卫连。要抢枪。这时警卫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齐开火。步枪冲锋枪一阵扫射，打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当场打死二十几个，伤得不计其数。可怜好些跟着看热闹的小孩子也被殃及池鱼。我认识的一个大孩子肚子都被打烂了。听说送到医院后，肚里的蛔虫都爬出来了。第二天，815派在院里展览对立派的罪行。灵堂设在大礼堂里。我们也跟着大人排队进去看。礼堂里，哀乐低回，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弥漫。五具惨白的尸体停放在舞台上。其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脸蛋白净而清秀，子弹在她的太阳穴上打了一个碗口大的洞。听说她是815派头头（那时叫勤务员）的女朋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而且是被子弹打死的人。

院里有座依山而建的林森墓。陵墓虽比不上中山陵宏伟雄壮，但也有几十阶台阶和高大的墓碑。我每天上学走小路都要上下台阶经过墓碑。因为统战的需要，林森墓一直保存完好。为了纪念这次事件中死亡的人，815派把林森墓毁掉。利用原来的基座，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碑。打开墓地时，我们都在场看热闹。那墓地十分坚硬。造反派锤砸棒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怎么也打不开。只好找了工兵来用炸药炸开。硝烟散尽，墓道洞开。露出一付棺材。我们引首翘望，期待着开棺后现出无数金银财宝。棺材打开了，却并无任何财宝，只扯出来一个身材短小的老头。仍然可见其摇曳的长髯。老头被扔进火堆里。难闻的气息窜起，我们立刻逃散。

武斗烈士纪念碑在毁掉的林森墓上耸立。它比原来的墓碑难看了许多。不过这座碑比旧碑寿命更短。七八年后，它又被炸掉。林森墓又按原样在原址重建，当然是为了统战的需要。林森的在台和海外的家属还时时来此扫墓凭吊。只是墓穴却已成空。

不上学了，整天都是玩。革命时代的娱乐带有革命的色彩。文革前集邮，集烟盒，糖纸。现在那都是四旧，改成集毛的像章了。为了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各单位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像章越造越大。从指盖大小发展到盘子大小。越大表示对领袖越忠心。材料开始是铝，后来越来越新奇。曾经见过塑料，陶瓷，竹制的毛像章。后来又流行绣毛主席像。把一张木刻毛像贴在一个塑料纱窗布上，然后全家老少坐在一起用各色丝线按照木刻上的线条用针穿在纱窗眼。绣的时候，要诚惶诚恐，忠心一片，沐浴在领袖的无远不屈的光辉下。再后来又流行木刻剪纸。木刻是刻毛的头像。剪纸是用剃须刀片在铁铅笔盒盖上刻样板戏英雄人物。四川多竹，我们把竹子砍倒，挖洞削节。制成笛子。竟然也能吹出东方红来。打扑克也很快流行起来。拱猪，争上游，升级，可以从早晨打倒晚上。珍宝岛之后，全国同仇敌忾。柏油马路上刷上了大标语：“火烧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每个字都是一米见方。战争气氛很浓。我和我哥还有邻家的小孩雄心勃勃，筹划秘密建设一个地下长城。平时在地下玩耍，苏修打过来，既能在地

下躲过原子弹的攻击，又能在地下打游击战。计划一定，说干就干。我们选定在荒野上的一个土丘后面开始了我们的战备工程。一个愚公能移山，我们三个愚孩还挖不出地道吗？我们三人轮流分工，一人望风，一人挖土，一人运土。先向下挖了一人多深，再向水平方向平挖了数米。这时一群小孩捉迷藏。一个小孩跑到土丘后面把我们的地道盖板踩翻，掉进了地道之中。地道的秘密暴露了，我们也停止了每天的挖洞不止。

动乱频仍，天府之国很快就陷入了物资匮乏。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缺肉少油，饭量大增。粮食定量不够了。世界观成为食物观。观万物皆以可食与否视之。林园多花草果木，多半可食。先是树上的桃李杏，半生不熟时就被摘光了。然后是地上的野葱野蒜，用酱油蘸泡后食之，味颇鲜香。把大头针弯成钩状，针尖砸平，锉出倒钩，便是一个很好的鱼钩。用竹竿尼龙线，穿上鹅毛剪成的浮漂。系上牙膏皮做的沉子。挖蚯蚓做饵，这种简陋的渔具居然钓上了五六寸长的小鱼。池塘中的青蛙肉也很诱人。于是在竹竿头绑上磨尖的铁丝，做成一把叉子。可是青蛙太灵巧，不易捕捉。眼见青蛙一动不动的地趴着，扎过去，青蛙已经在最后一瞬间跳到一边。半天，只捉住一只。又为如何吃讨论了半天。僧多粥少，只好剥皮后煮成一锅汤。每人一口，觉得味道特别鲜美。有一次，看见稻田水中有很多小虾。回家后用旧铁纱窗折成盒子，在田中打捞到很多小虾，用油盐一炒。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虾。房檐下有很多麻雀窝。我们常常去掏鸟窝。掏得的鸟蛋用火烤熟，可与鸡蛋媲美。除此之外，我还捕食过田里的泥鳅，塘中的螺蛳，沟里的螃蟹，草上的蝗虫。

造反派忙于打派仗。我们的生活一度平静。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家家户户都养了鸡鸭。父亲也从集市上买回十几只毛茸茸的小鸡。邻家的老猫不会捕鼠，只会偷鸡。不几天就有几只小鸡雏葬身猫腹。我们把小鸡关在屋里，但是仍然难以避免不时有小鸡溜出门外，而那只老猫似乎时时就等在门口，溜出散步的小鸡，都是有去无回。气愤之极，我拟写了一个讨伐邻家老猫的判决书。宣判此猫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兹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贴在邻家门口，引起众人围观，人人称快。唯有猫主人心恼恨。但惧于众怒，不敢公然表示。只好将老猫关于家中，小鸡们得到了几天太平日子。但终日有强敌虎视眈眈，小鸡们难以苟活。最终只有两只小鸡猫口余生，长大成鸡。一只芦花黄，我叫它小黄，一只黑母鸡，我叫它小黑。小黄小黑身躯虽小，却是生蛋能手，几乎每天一个蛋。后来流行鸡瘟，家家户户的鸡都死了。小黄小黑也被传染了。看着它们闭着眼睛，萎靡不振地躺在地上，我去央求父亲想办法。父亲把黄连素，土霉素碾碎，用水灌进小黄小黑嘴里。小黄没有救过来。小黑病好了，但是却瘸了一条腿。小黑少了自小相伴的朋友，每日拳着瘸腿踽踽独行，没有多久也死了。我还养过一只鸭子，这个鸭子很聪明。我每天给它喂食。它和我很熟。老远一叫它的名字，它就会嘎嘎地叫着跑来。时间长了，我们和它有了感情。到了鸭子长肥的时候，父亲决定杀鸭子吃肉。平时杀鸡杀鸭的任务都是我们兄弟俩的任务。那天我们拒绝杀鸭子，从家里跑出去。在外面玩了一天，连午饭都没回来吃。晚上我们偷偷溜回来，扒在厨房的窗台往里一看，鸭子一动不动，脑袋耷拉歪在一边。原来父亲已经把它杀了。

文革开始时破四旧，除老毛的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书都被查禁了。我们家里藏书颇丰，包括许多文艺书籍。文革初起人心惶惶，担心被抄家，父亲挑出了许多书，在柴灶上架锅，量米加水，灶下举火烧书。我负责将书一页页撕下，送进灶中。看着炉火跳跃着，将书页烤焦，卷曲，终于烧成灰烬。我感到既有趣，又可惜。可惜的是，这么多书还未读就被烧掉了。两三本书烧完，一锅米饭已熟。尽管烧得烧，交得交。家里仍剩下四木箱再加三麻袋的书。记得小时候最激动的事就是和我哥趁大人不在时，两人卯足力气，把死沉的书箱抬下来，一本本地寻找有趣的书。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名著我就是在这时读的。象《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说唐》，《说岳全传》等等。我们还在这里找到了许多文革前出版的“收获”杂志。看完后，我们把书借给朋友，最后都丢了。

文革前我常常在放学后到院里的图书馆看民间文学。这时图书馆已经被封了，大人们忙着搞武斗，图书馆已经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有一次，我们经过那里，偶然发现门上的气窗没锁。气窗不大，只能让我们小孩钻进去。进去一看，里面有四五间屋子，门都锁着，但上面的气窗都没关。屋里有很多书架，书却被扔的满地都是，想必文革时这里被破四旧的人光顾过。显然造反派们当时情急，曾把这里当作厕所，陈年的屎尿味混杂着旧书味弥漫室内。不过对着一屋子书，这种味道也觉得是美味。我们就象老鼠掉进了米仓。从此我们经常从我们的秘密通道爬进图书馆里看一天书。临走时也不忘背一书包挑好的精品带走。

这样的岁月直到70年，我们离开重庆，一家随父母去江西干校。

□ 读者投稿

~~~~~  
【各抒己见】

从“文化大革命”到文化与制度
——读《朱学勤在“凤凰世纪大讲堂”的讲话》所想

· 北国游子 ·

朱学勤先生是国内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向为笔者所仰慕。朱先生作为“问题中人”，问题是：“过去的一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多灾多难，灾难最后推到顶峰为什么会是文化革命这样的产物会出现”，“中国怎么了，怎么会走到那样惨烈的一步”？这也是对中国现今社会和未来发展有所思考的人们心中的一个大问题。而题中的关键——“文化大革命”，更是所有思考着的人们一直在心中探索、欲言又难言的块垒。

笔者在学识造诣上自是远不能与朱先生比肩，但作为同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在其中曾真诚地全心投入，在其后也一直在苦苦思索。在新世纪的网络时代，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交流不再受述作发表的局限，尽可自行公诸于网，与广大网民探讨。而出自非学者的常人之见，也许为学界提供了多一些的参考，至少多一些视角是无害的。

由此，对朱先生在“凤凰世纪大讲堂”的讲话《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即本刊200403d所载“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一文——编者），提出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若有不当之处，恳望先生指正并海涵；网民朋友若有指教，亦望不吝抛玉。

—

到底何为“革命”，应该说有许多定义，如“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我想，是否可以说：革命，是对现有秩序的颠覆。无论是在政治、文化，或其他领域，甚至我们有时也说“相对论”是对经典物理学的革命。此文中，所谓“现有秩序”，是指现有社会秩序。我们就以此概念进行讨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颠覆”，是指对被颠覆对象在本质上的变革，并非指暴力手段。此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中的“颠覆”有着语境和语义上的不同，也特意在革命的概念上以“颠覆”区别于“暴动”。

以“小革命”和“大革命”来区分英美和法国的革命，不知是否界限就在对文化思想领域的保守。有关革命和文化的关系我们留待下文，我们先从上文所定义的革命概念来分析。

既然革命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我们看英美革命中的“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是什么。就用朱文的说法，英国“触动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甚至于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美国“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出现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是“0·5场的革命，它比英国革命来说它只有政治革命”。与其说“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不如说是颠覆了社会的基本规则。

再来看法国革命。朱文说“法国革命我们知道教科书告诉我们三阶段。……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1793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到1794年嘎然结束”，“雅各宾党人称自己这一年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他们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那么，到“1794年嘎然结束”后，法国是否已经完成了现代法国社会制度的基础呢？或者说，现代的法国社会是不是就建立在“1794年嘎然结束”的基础上呢？

法国革命自然是和英美革命有许多的差异，其实英美革命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其差异足够使我们从法国革命中找到“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从当前的现实看，至少最后的结果是：法国和英美革命后产生的社会制度，与产生“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制度分立于人类社会文明的两岸。

由此，无论是从法国革命的过程，以及其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还是从现阶段人类文明的分划，都不能说就从中找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至于“文化大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改名字”，更难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问题所在。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分析，我们也暂且留待下文。

俄国革命，当然与“文化大革命”和中国革命可有一比。但把“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符号并不一定全面、准确。“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与现实生活中的工程师对应，强调了教师对人类文化精神上的培育作用。其“灵魂”的用词确有不妥，但在此处未必就直接传承了中世纪教士的指向。当然，“我们政治文化里面……最反动的一个符号”，无疑就是对灵魂的精神桎梏，有如亿万群众用一本语录、追随一个思想。但，这不正好是需要文化领域中进行“革命”的原因和目标吗？

朱文中将英、美革命和法、俄、中革命的根本差别，认定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和“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既然你面对的是“政教合一”，而“政教分离”即是“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那么，在“政教合一”中政治与文化已经是“合一”了，你又如何做到颠覆它政治的一半而保留它文化的一半呢？还是回到我们对革命的定义——“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而这“现有社会秩序”中，由于是“政教合一”的，也就自然包含了文化的内容。因此，要颠覆“现有社会秩序”，就不得不将其中的文化一并颠覆；若要不触及并完整保留其“合一”的文化，就只是在形式上的制度变革而已，复辟将是必然的。

英、美、法、俄、中的革命，都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所以都可称为革命，这是他们的共同点。而若从最终产生的革命结果——社会制度来看，还是将英、美、法与俄、中分为两类更为恰当。其分划的标准，也就是我们所期许的革命，从我们对革命的定义来看，就是用什么样的新秩序来替代旧秩序。结合当前人类大家庭的现状来看，这就是民主文明的社会秩序和专制文明的社会秩序。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到底是在哪里开始走向岔路的，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对梁启超、胡适、鲁迅的评价，也是太大的话题。都不好在这里展开，本人也不敢妄言。但是，鲁迅何时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呢？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对国民性进行分析和批判，是义之所在。其中的阿Q、假洋鬼子和赵太爷，以至狂人眼中的世态，到今天，还到处可见。如上述，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制度问题和文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根据《金山词霸》：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这样的解释显然没什么意义，虽难说它错。文化其实是个很难定义的概念，但为叙说方便，不得不在本文中给个“说法”。如有不当，还望看家就事论事，不要扯远了。

文化，可以理解为一个特定人群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潜规则。根据所指定人群的范围和所规定对象的不同，其义可大可小。例如，当网络上的人们逐渐用同一套新的表达语言时，大家也称其为一种网络文化现象；当深圳特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快节奏、讲效率，相对淡漠人情和地域观念……等，大家也称其为区别于内地的特区文化现象；好面子、讲排场，注重社会表象而不顾实际效果，趋附上级而忽视下情，对上负责而对下玩忽……这也是“某人群”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潜规则，也可称其为“某文化”。此“某文化”渊远流长，应该说既有五千年的传统，又有近五十年的创新。笔者有所体会但无力为之概括阐述，还望学有所专者能够深入探究。

在本文中所说的文化，应该有更大之义。如何确定相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所言的文化概念呢？从我们的定义来看，首先，我们所指的人群，是指一国的国民；再次，我们所指的思维和行为，关乎国计民生、国体制度的思考和言行举止。如，阿Q、假洋鬼子和赵太爷对社会变革的态度，狂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如，当无端的迫害施之同类时自我取向的选择，当显见的谎言和荒唐铺天盖地而来时能否坚守良知，当身边的人们被迷惑和煽动得痴狂失态时能否把持独立的思考……这些，都不直接涉及到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更谈不上是革命——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

但是，正是国民在这些问题上的思维习惯，首先为中国百年来的灾难提供了土壤；接着，国民在这些问题上的行为方式，又使“始作俑”者的个人意志得以成为神州大地上的延延之灾。这样的文化，显然有其文化自身的来源，也显然必须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追寻其发端。不对五千年文化延续到现今而产生的以上诸多表现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对现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颠覆将失去底蕴的依托，也难有彻底和完善的结局。

三

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更是个太大的话题。首先，没有一个探究以往存在的许可，也就不能充分地占有事实而去做实在的思考；其次，没有畅言己之所见的环境，更无法展开认真的讨论和分析。由此，本人不敢直对该话题，本文也不在此全面展开，仅对朱先生讲话中的一些说法提出自己的商榷。

朱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并列为政治和知识界两个层面，似乎不大完备。以“历史决议”为代表的政治层面的否定，其本质是以维护现行社会稳定为前提；而知识界的否定，则有众多的角度和立场：其一是从现实生存考虑，为稻粱谋，只能轻描淡写，言不由衷，至少是言之不尽；更恶劣的，为仕琪所折，掩饰美化，唯上命是瞻；而认认真真、实事求是的，就只能是少数，而且少有话语的空间。对“知识界”的如此现状，应该说首要的是探究和言说的自由。而在此状态下去概括知识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和批判，则难中其的，也有所不公。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目的，一般说主要有两大观点。一，认为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二，认为是不成功的“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一个是纯粹的政治目的，或说是为制度所决定；一个则更多具有意识形态的理想色彩，其实也难完全归于“文化”的概念。

笔者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文化大革命”前源于“大跃进”的乌托邦；从制度上，则决定于“和尚打伞”可以“无法无天”的制度。至少可以说，没有“和尚打伞”可以“无法无天”的自由，在实践上也成就不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即便在初衷上是意识形态的“继续革命”，在行动上也不能不用“权力之争”来保障“继续革命”的进行。更何况，无论从“大跃进”甚至“合作化”以来，“权力之争”一直在“干扰”着“继续革命”，而“七千人大会”之后，和尚的伞已经举得不那么高了。

可以肯定，在“文化大革命”发端者本人的观念上，有着深层的意识形态成分——但这个意识形态，并不简单的就是对文化传统的颠覆；但正是其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政权”、“阶级斗争”，也就是权力斗争，为其所“念念不忘”，并由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朱先生说：“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

不妨设想，要是胡适、或是鲁迅，能够施展自己的理念，难道中国也会进行哪怕是有一点点类似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所追寻的理想，还是更多、或说主要来源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炮声，然后在五千年文化的土壤中吸取营养，最终变成了“秦始皇加马克思”。若说是毛泽东一直追寻着以胡适和鲁迅为代表的“文化理想”，又何至于在一九五五年展开胡适思想批判，并出版了八大本、200余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何至于说鲁迅“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至于对胡适、鲁迅、矛盾、郭沫若、巴金等为代表的“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说：“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结果”，“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这就更牵强了。从毛泽东的所有发表过的论著来看，几无文学作品；从其思想体系来看，也多是社会分析、政治斗争、军事战略。其中哪有来自所列知识分子的文学营养和文化理想呢？就是在诗词中，也多是战争题材。

四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该说密不可分。“五四”运动起因于巴黎和会，被标志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并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发端，无论其中、其后有多少偏差和歧路，这发端的意义是永存的。

笔者更觉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该贯穿起来看；尤其在讨论中国的文化进程的时候，应该将“五四”运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剥离开。当然，笔者也不否认“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许多联系，但这是另一个论题。至于“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的“这个思想脉络”，恰恰是应该从中国百年文化进程中剥离出来的题义。

简言之，“五四”运动有其两重性。一个是“革命性”，一个是“文化批判性”。将其由“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声而发展出来的“革命性”，混淆于其和“新文化运动”密切相联的“文化批判性”，是对中国百年来社会演变和“文化大革命”认识的一个偏差。“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不是源自“五四”运动的“文化批判性”，而是源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声的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理论引导的“五四”运动的“革命性”。

把“文化大革命”归于从胡适到鲁迅的文化理想脉络之中，认为：“‘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胡适也罢，鲁迅也罢，矛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理想核心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啊，都是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也正是对“五四”运动“文化批判性”认识的偏差。

至于“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原文为：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三一二页）

注意到时间是在七六年“四五”之后。与其说是在强调“文化大革命”为自己“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从言者一贯的话语风格和当时的形势看（广场上百万民众对周的怀念和直指后宫的谴责），倒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耿耿于怀。

五

对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自然有当时形势不够宽松、不能正面讨论制度选择的环境限制；但，即便那是始作俑者的话语策略，也并不说明从文化批判入手是以假充真，更无法说明文化批判“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了‘文革’的一个精神内核：文化决定论”。

“黄河文明”或“黄色文明”的判定尽可深入讨论，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存在并延续了五千年；在这个文化基础上，产生着轮回不已的专制制度，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陷入整体疯狂，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在阳光下涂抹上“革命”的色彩。这里一方面是制度的规定，一方面不能不说也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而每个人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所遵从的潜规则，即直接来于文化的侵淫。

制度和文化，谁决定谁？这有些象是鸡和蛋的孰先孰后问题。鸡和蛋的问题曾是哲学上一个有趣的悖论，其实，没有鸡的概念，何谈鸡蛋；而鸡的概念本身，也已经包含了鸡蛋的存在为前提。制度和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文化，是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潜规则；而制度，则不妨说是人们行动的显规则。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潜规则，显然要受确立的制度显规则所规范；而制度显规则的建立，也要以人们业已形成的潜规则为来源。文化不能超越制度，而制度也无法脱离其所在的文化背景。

具体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首先是已经确立的制度保证了运动的发动和推行；同时，

每个人在多次政治运动和多年政治教育中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是运动得以轰轰烈烈、深入每一个家庭的基础。而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是根植于五千年文化中的。

六

“文化决定论”无疑是错误的，说“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否定传统的文化，才能够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现代化”也无疑是错误的；也并不是说孔孟和儒家文化就一定会束缚中国的发展，更不是说“民族的落后、现代化的障碍是要由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负责”。但是，如果不在文化传统的深度上进行挖掘和反思，就不能在根本上更新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就无法在制度的选择和创新上有所进步；在三千年之后，如果不对孔孟和儒家文化有所扬弃，也就必然会束缚中国的发展。

在当前，无论是文人学者的论著，还是普通民众在网络空间上的言说，时时可见文革式的话语，从中当然也就反映了文革式的思维。如不能善意平和地进行讨论，而是扣帽子、打棍子、“砍砖头”，嘲弄甚至污言秽语；如没有倾听的修养，而只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如甚至在自己并不足够了解的问题上，不是虚心学习提高，而是凭着半瓶子的喧嚣，以目空一切的只言片语傲视他人……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在当时未成年甚至未出生的青年之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这难道不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至今尚在吗？

“文化决定论”和“海外新儒家”，要么彻底否定，要么全面肯定，恰恰是我们沉迷多年的“黑白式”二元思维，犹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国内，无论是“舆论导向”还是民间思想，并无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提倡或趋向；而“海外新儒家”论却有着种种类似的说法，如“以德治国”，也常见对新加坡政体和制度的赞赏。

如前所述，制度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延续至今的专制制度也和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传承。为着制度的“稳定”，主流的控制——也恰是发展的束缚——恰为五千年文化传统中最为应“弃”之部分；而传统中的其他部分，甚至包括可“扬”之部分，却可以任由把玩。在“坚持”着最为应“弃”之部分的前提下，随意批判着其他部分的所有。这，恐怕也是造成一些人担心失去传统的一个原因吧。也确实，在如此“坚持”下进行批判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劣文化驱逐良文化”。那么，结论就很清楚了：不是“文化不能碰”，而是必须首先“碰”掉文化传统中那个作为制度来源的部分。

中国目前的症结，不是文化决定论，也不是人们的利益觉醒不够，更不是民主的热情不够。“文化不能碰”，则无法根除制度的源头；在不改变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仅有了利益觉醒和民主热情，也无法突破症结。阿Q若有了民主要求，自然不用再读《阿Q正传》，但不能由此否定《阿Q正传》对国民意识觉醒所起的作用。同时，你明白了“最要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能被人无情的、无偿的圈占”，而人家就是无情地、无偿地圈占了，你又如何？

蔡定剑的报告告诉大家“农民是否有民主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这自然是对的。甚至《新华日报》早在1944年2月2日的社论《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中就说了：“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但为什么在六十年后，人们还停留在这个“非常重要的”的论断上？朱先生说的好：“对制度创新、制度选择”是不能模糊、不能否定的。这，也许是个答案。

七

朱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并列举了香港和台湾为例，与中国大陆对比。

“中国大陆，经历过从‘五四’以来几次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破坏的就是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制度选择，你看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

显然不是。但，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在“坚持”下的批判，是“劣文化驱逐良文化”。上面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但香港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民主；“香港在1949年到1997年这个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恰恰是其制度的支持。而香港社会回归后的许多变化，更说明了制度对一个社会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的影响。至于“香港市民文化”，其中的传统色彩也未必都是可褒扬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负面影响，不能不说很多是来自香港。如造假、媚俗、迷信等；甚至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寻租上，香港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港台企业在原地不敢为之野蛮残酷的管理手段，却在内地广为行事，令人惋叹不已。这更说明了制度的约束和作用。

至于朱先生说到的台湾，一方面是“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一方面又说“半个小时以前是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最后，“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

家庭中对政治生活的参与选择，甚至发展到吵骂，和“文化大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完全无法类比。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固然还有太多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但终究有了民众进行自由选择的制度保证。说“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未免过于武断；而饭桌上的长幼有序和其乐融融，也并不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全部。由这前半个小时加后半个小时的一桌饭，就认定“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则太过于简单。

八·结语

文化与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制度的建立和存在，必有其文化的基础；而制度的更新，也必得同时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俄、中革命的根源，与其说在法国革命中，不如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而“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从文化的角度，从人们“当无端的迫害施之同类时自我取向的选择，当显见的谎言和荒唐铺天盖地而来时能否坚守良知，当身边的人们被迷惑和煽动得痴狂失态时能否把持独立的思考……”，还可以上溯到“焚书坑儒”和历代“文字狱”存在其中的五千年文化传统。更精粹的，“好面子、讲排场，注重社会表象而不顾实际效果，趋附上级而忽视下情，对上负责而对下玩忽……”的“某文化”现象，也决非从天而降或仅来自领袖的个人好恶，是必须溯源五千年文化传统之中才得以根绝的。

“文化大革命”冠名于“文化”，从批判《海瑞罢官》入手，发展到“破四旧，立四新”，“八个样板戏”横扫一切文艺舞台，几乎所有文人学者声名扫地，“红宝书”走向世界，“教育革命”等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全面专政，“批林批孔”“评水浒”……看似全都是在革“文化”的命。但若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来看，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在颠覆现有的文化秩序，不如说是在修正、完善之，以使其更加符合现有制度的需要。因为我们从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完全看不到有变革现有制度的一丝迹象。由此，若说是“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

革’”，则所指应是“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而非其“文化批判性”。

制度和文化的“决定性”，犹如人的两只脚。无论迈哪只脚，若是另一只脚“不能碰”的话；结果只能是有限的一步，而且决达不成稳定的状态。说“制度决定文化”是对的，在一个极端的制度之下，不可能生存另类的多元文化；说“文化决定制度”也是对的，在腐朽的文化之下，不可能诞生先进的制度。当制度变革了，文化必将发展；若落后的文化更新了，也势必推动制度的改革。

即便是暴力革命，其实也自有其意识形态上的启端。无政府主义也罢，无产阶级专政也罢，虽不能说是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文化理念，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更必须有足够的“特定人群”所支持。对于渐进、改良的社会变革，则一定要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在理念上的认同，也就必须要对国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文化的意义上进行改造。

百年来的中国，自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被“五四”的“革命性”所中断，何尝有过对自身文化的认真反思和批判。专制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寻找自身权力合法化和如何巩固的精神资源。“文化大革命”，便是在建制 17 年后对传统文化的自适性整合和极端化发展。其破除“四旧”后所立的“四新”，无一不是自身意识形态的翻版；而“四个无限”的“四个伟大”、“万寿无疆”等，却恰是五千年文化传统中最腐朽、最恶劣的核心。

回望百年，展眼未来，人类文明的民主潮流不可逆转，而我们仍在摸索中徘徊。暴力革命曾带给我们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而眼前的现实，使我们在一次次“维权”“成功”的喜悦和终得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之间，象哈姆雷特自言自语“生存或毁灭？”般踌躇犹疑……

我最后想说的是：制度的更新是目标，是决定性的。但在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时候：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反思和扬弃，在对传统的批判中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一点一滴地从自身作起，为所能为，争其要义而不舍；不求一事之所得，寄望于过程之中自我锻炼和完善提高。无论太阳明天升起，还是尚有黎明前的更加黑暗，我们都会在等待中不弃不舍，锲之以恒。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八日

□ 读者投稿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